

董其昌書画代筆人考

肩 功

明末書畫家董其昌^①，在創作和理論上，都曾起過極大的影響。成為三百年來美術史上的一個重要人物。他創作的優劣，理論的利弊，俱不是簡單幾句話所能說完的，現在不作詳論。他的書畫作品中，有許多是他自己委託別人代筆的，這對於他平生藝術成就的真象和評價，便發生了問題。本文專就他的“代筆人”方面作一些考索。謹具初稿，就正於讀者。資料續有發現，再為訂補。

董其昌以顯宦負書畫重名，功力本來有限，再加酬應繁多，所以不能不乞靈於代筆，圖利的又乘機偽造，於是董氏書畫，越發混淆莫辨了。有人問：時隔三百年，這事你是怎樣知道的？回答是：我們從前代人記述直到董氏自作的書札中得若干條，再來印證他的書畫作品，是分明易見的。因為一切技藝的事，造詣生熟，一覽可見，在同一類的藝事中，已經真“能”或真“熟”的人，必不可能復有真“生”或真“拙”之作。至於書畫，一個作者年齡的老幼，工具的好壞，興會的高低，甚至遇病臂傷指之類，也都有其規律可尋，絕不能同一時期的作品，筆性竟全然如出兩人之手的。在董氏的繪畫則不然，今舉通行影印本為例：如吳榮光藏《秋興八景》冊（文明書局影印）、《董香光山水冊》十頁（有安岐、王鴻緒、石渠寶笈、定府行有恒堂諸藏印，中華書局影印）等為一類，雖亦各有所長，但“生拙”之處，明顯可見。而“峒關蒲雪”等沒骨設色的畫，以及煙雲渲染極工緻的畫為一類，都精能熟練，與二冊一類之筆，判若兩人。若說“由熟返生，大巧若拙”，那麼“返”必有其過程，“若”必帶其本色，而董畫這兩類之間，並未見相通之處。再証以各條文獻，其中消息是不難探索的。

我們又常見并世名畫家之有代筆的（非經常的，或有其他一時原因的，不詳論），不出二類：其一，自有本領，而酬應過多，一人的力量不足供求索的眾多；其二，原無實詣，或為名，或為利，僱傭別人為幕後捉刀。董氏的找人代筆，這兩類原因中，是各有一部分的。

茲先舉旁人所記的間接證據：

姜紹書：《韻石齋筆談》卷下“書家餘派”條：

“……元宰門下士則有吳楚侯。楚侯名翹，後改名易，以能書薦授中翰。為諸生時，思翁頗拂拭之，書稱入室弟子。崇禎癸酉，余游燕都，適思翁應官贛之召，年

^①董其昌，字玄宰，號思白，華亭人，官至禮部尚書，謚文敏。

八十餘矣。政务閒簡，端居多暇。余时过从，而楚侯恒在坐隅。长安士紳祈請公翰墨无虛日，不异素师鉄門限。公倦于酬应，則倩楚侯代之，仍面授求者，各滿其志以去。楚侯之寓，堆积綾素，更多于宗伯架上焉。虽李怀琳之拟右軍，不是过也。惟知交之篤，及賞鑑家，公乃自为染翰耳。……”

姜紹書：《无声詩史》卷四：

“赵左，字文度，雲間人。画法董北苑、黄子久、倪雲林，超然元远。与董思白为翰墨友，流传董迹，頗有出文度手者。两君頡頏艺苑，政犹魯卫，若董画而出于文度，縱非床头捉刀人，亦所謂买王得羊也。”

朱彝尊：《論画絕句》：

“隐君赵左僧珂雪，每替香光应接忙，涇渭淄澠終有別，漫因題字概收藏。”

自注云：“董文敏疲于应酬，每倩赵文度及雪公代笔，亲为書款”（《曝書亭集》卷十六“論画絕句十二首”）。

顧复：《平生壮观》图繪类卷十：

“先君与思翁交遊二十年，未尝見其作画。案头絹紙竹簾堆积，則呼赵行之洞、叶君山有年代笔，翁則題詩写款用图章，以与求者而已。吾故不翁求，而翁亦不吾与也。聞翁中岁，四方求者頗多，則令赵文度佐代作，文度沒而君山、行之繼之，眞贗混行矣。”

顧大申：《董尚書画卷歌贈朱子雪田》：

“……尚書（原注：董文敏其昌）雅得鍾王眞，画通書理空前人，下笔森瘦秀彻骨，吳振赵左（原注：振字竹屿，左字文度，皆同时工画者）皆遼巡，左之淡逸得天趣，振也瀟洒工枯树，董公墨妙天下传，潤飾特資两君助……”（李响泉先生濬之：《清代画家詩史》甲卷下引）。

程庭鷺：《篋菴画塵》卷上：

“曾見陈眉公手札与‘子居老兄’，‘送去白紙一幅，潤笔銀三星，煩画山水大堂，明日即要，不必落款，要董思老出名也。’今贗董充塞字內，若沈子居、赵文度作，已为上駟矣。文度虽为香光捉刀，然其生秀处，能自成一家。”

赵左、沈士充的画，流传較多，面目易見，董款画的精能的，大率是二君之笔。珂雪法名常瑩，传画不多，有影印本的，如风雨樓印《繪林集妙》冊中一頁，水墨湿润，董款画中稍較疎拙的即以他的风格。吳振画曾見挂幅冊頁二件，近于赵、沈画派。

张敬园先生（璋）藏赵左紙本浅絳山水卷題云：

“溪山无尽图。戊午秋九月，偶寓浦东寒花館中，雨窗漫作，輒似利家山水也。赵左。”

这卷笔墨，正是程庭鷺所謂“生秀”的，以其略近董氏亲笔一路，所以用“頗似利家山水”来自作解嘲，这在赵氏，实为故意弄笔的作品，譬如魯智深装新妇，仍露英雄本色的（利家又作戾家，即“外行”之义，余别有考）。

梁紹壬：《两般秋雨菴随笔》卷一：“代笔”条云：

“古書名家，皆有代笔，……董华亭代笔門下士吳楚侯。……”

邓文如先生（之誠）：《骨董瑣記》卷四：“董思白代笔吳易”条：

“董思白門客吳楚侯，名翹，改名易，以能書荐授中書，思白官京師，率令楚侯代筆。”

以上梁、鄧二條，俱未著出處，實皆出于《韻石齋筆談》。吳易畫，“故宮周刊”第三五四期曾印一幅，題曰“礪戶松濤”，字體既似董字的板重一路，畫也似董畫親筆生拙的面目，吳易可能并不止書法代筆，董畫“不搭調”一派的作品里，恐怕正有吳氏的筆迹在。

趙、沈之畫，深造自得，實自成家，董氏請他們代筆，不過是在趙、沈畫上自署董其昌名款罷了。至于吳易這樣作風，捧心效顰，描摹董畫的“稚態”，如果是為董代筆，還可以說是要必求似真，而自己出名書款的畫，仍作這樣面目，豈不可怜。但試看“側帽”“洛詠”，一時尚且成為風氣，董氏達官畫家，雖然病態也必有仿效的，那麼吳易這樣作風，也就無足怪了。

唐志契：《繪事微言》：《畫要明理》條云：

凡文人學畫山水，易入松江派頭，到底不能入畫家三昧，蓋畫非易事，非童而習之，其轉折處，必不能周匝。大抵以明理為主，若理不明，縱使墨色烟潤，筆法適勁，終不能令後世可法。”^①

這話很明顯正是對董其昌而發的“墨色烟潤”，而“畫理不明”既非“童而習之”的行家，自不能“轉折周匝”，以今天的俗語來說，就是“客串”而已。

董其昌：“畫禪室隨筆”卷二“畫訣”類一條云：

“潘子輩學余畫，視余更工，然皴法三昧，不可與語也。畫有六法，其氣韻必在生知，轉工轉遠。”

什麼是皴法三昧，怎樣便有氣韻，是否必須不工而後才有氣韻？俱不是片語所能盡的。惟這“潘子輩”的“工”與“不工”實是與董氏比較而言。潘子不知何名？畫是什麼樣也不得而知。如果是作趙沈一派的“工”那麼董氏的話便是自掩其拙之詞；如果是作吳易一派以似董親筆為“工”，那麼邯鄲之步，理應為董氏所笑。我們常見許多專仿某家的，往往只得一些皮毛習氣，甚且變本加厲，使他們的師傅看見，反覺慚愧。所以“轉工轉遠”之評，也可能是由於這類緣故。唐孫過庭《書譜》說：“或藉甚不渝，人亡業顯，或凭附增價，身謝道衰”。趙、沈雖以僱畫為董氏代筆，而他們的藝術實自有成就，所以至今其畫其名，流播不替；而吳易輩的畫，幾乎不傳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

倪燦：《倪氏雜記筆法》：

“余見董先生刊帖，戲鴻堂、寶鼎齋、來仲樓、書種堂正續二刻、鶴鶴館、紅綬軒、海漚堂、青來館、兼葭室（堂）、眾香堂、大來堂、研廬帖十餘種，其中惟堂、寶鼎齋為最。先生平生學力皆在此二種內，其餘諸帖妍媸各半，而最劣者則戲鴻青來眾香也。此二帖筆意酷似楊彥沖，疑其偽作也。”^②

①唐志契生存年代不詳，余氏《書畫書錄解題》卷十二“著者時代及著書年分表”于唐志契下云：“四庫列傳穆、趙宦光前，約嘉隆時人。”功按《繪事微言》中“名人書畫語錄”條首引董其昌語，則至早是董氏同時的人。

②《倪氏雜記筆法》，原書未題作者姓名，倪燦《六藝之一錄》卷三〇三引“倪蘇門書法論”各條出于此書，知其為倪燦撰。燦字閣公，號蘇門，康熙時人。據他書中所記，早歲曾見過董其昌。

董其昌：《容台別集》卷三：

“楊彥沖者，余友楊彥履宮諭之弟，庶常元章之叔。善詩畫，尤好余書。常从余為玄真釣舫之游，所得余行楷甚真，又時有摹本，且十卷矣。余既入長安，而彥沖盡以入石，念余書多贗本，又懶役手腕，以此為馬文淵銅馬之式，命之曰銅龍館帖云。”

銅龍館帖確屬楊彥沖所刻，為倪氏所未談及的。

現在再舉董其昌自己筆下的直接証據：

曾見蒯若木先生（壽樞）舊藏董札一冊，共四札，第二、第三兩札云：

“唐茂宰炫才无忌，不肖往年聞之，已知有不終之理，今果然矣。老姪燭然自遠，不及于議，尤見清謹，大用之基也。不肖將往長安，又聞遼警，恐道路為梗，尚在維谷。友人楊彥沖精于書畫，嘗為不肖代勞，今不肖且有遠出，此君素善新安諸君子，是以游新安，若至休邑，幸老姪吹噓于所知，彼以力自食，亦人所欲求，无奢望，不妄干也。幸老姪勿置无事甲中。不一。三月十三日，叔名正具。左沖”（此札首行存騎縫半印，文曰“其昌”）。

“聞曹中丞且至，老父母必于月末集于金閨，冀得一奉光霽也。春間貴同年楊方壺曾以其族叔楊彥沖書畫友奉薦，盩山人之謹慎有藝能者，向有遠游，未曾伏謁，茲特造候，幸命閭者，并有培植。至于方醫，虽索不佞八行，然其人虛誕，非楊生之流，不佞不敢不直告也。不一。名正肅。左沖。”

这札后有翁方綱跋云：

“此札內所云楊彥沖者，嘗為董文敏代筆，蓋當日書畫，倩友代作者，非一二所能盡也。昔王右軍嘗亦倩人代書，其人姓任名靜，今人罕有知之者矣。若此楊君者，非文敏自言，其誰知之。方綱。”

按《无声詩史》卷七：

“楊繼鵬，字彥沖，松江人。畫學師資于董思翁，頗能得其心印。思翁晚年酬應之筆，出于彥沖者居多。”（《无声詩史》卷七；“方洛如，失其名，松江人。體質清癯，丰骨傲岸。精岐黃之術。寫山水，林壑葱秀，氣韻藹然。”董札所云方醫，殆即其人。）

董將遠出，薦代筆者于他人，足見這位楊君平日生計仰給于董，他所代之作，定非少數。又翁氏說“其誰知之”，不知姜紹書、倪燠早已說過了。又見黃賓虹先生舊藏董札一冊，冊一札云：

“暑中以禱藏為嫌，不能相過從為念。久不畫，時以沈子居筆應求者，倘得子居畫，不佞昌可題款，否則使者行期有誤，奈何奈何！全幅奉納，以省往來之煩。弟名正具。左沖。”

撕開假面具，可并“潤筆銀三星”亦省，足見董的老辣手段，官僚與江湖的作風，兼而有之。至于這人求畫必用“全幅”紙絹，所求又為達官，這是怎樣的一個人，不問可知。這樣人受到這樣對待，也算是咎由自取的。

日本中村不折藏董札十通，與董書古詩卷合印一冊，標題曰《董其昌書詩卷尺牋》（孔固亭真迹法書刊行會印），其中一札云：

“米卷即携来看，汪丈索画大幅，足下过我一談何如？寿甫丈，其昌頓首。”汪丈索画，而須寿甫来談，实在也是找他代笔罢了。我曾疑“寿甫”是葉有年的字，确否当待續考。

裴景福：《壮陶閣書画录》卷十二，“明董香光寒林小幀”董自題云：

“受之太史示余李营丘寒林落日图，精妙絕伦，因篝灯仿之，但不耐設色，留置案头，适文度过訪，遂足成之。逊之璽卿于余画有昌猷之嗜，并旧摹九册寄呈，尚有泛泐图，当續請教也。玄宰。”

裴景福記云：“絹本，寒林浓翠欲滴，以胭脂烘落日，真奇丽之观。”功按这虽是代笔与亲笔的混合物，但足經絢丽設色的画多出提刀人。

樊增祥：《樊山集》卷十四題“赵文度为吳澈如画南岳山房图”七古一首，自注云：“王百穀、董文敏題”。自注又录董跋云：

“文度作此图，三年始成，未書名款，亦如北宋諸名手，自負甚高，待人暗中摸索耳。庚午为拈出。”

这件画大概也是不必落款，要董思老出名之物，王百穀題之在先，乃設“权辞”自解的。还记得先师賈義民先生（尔魯）曾談：董常購買沈士充的画而把它撕毀。当时沒有請問出处，并且以为这仅是因为妬能，現在明白，可能是恨沈士充自署了名款。

繆曰藻：《寓意录》卷四，“董元宰杜陵詩意图”董氏自題四段，其第三段云：

“正字赵使君数徵余画，久已閣笔，而伪本甚多，不敢以应。青谿雷山人大綸为公門下士，收得此图，俾題以贈。”

書画的伪作与代笔不同，伪作是他人伪造某人之作，某人完全不知，也沒有責任可負；代笔是請別人代作，而自己承名，責任应由承名的人自負。这条所謂“伪本甚多，不敢以应”，是說市肆流传伪本多，不敢收購来贈朋友嗎？那么自己慎重鑑选，有何不可？如果并指代笔之作为伪本，那便是将自己应負責任的一并推卸。沒想到实际已經自曝平日的欺人，“遁辞知其所旁”，此之謂也。

又錢謙益《列朝詩集》丁集下，董其昌小传，曾記他繪画代笔的事。世行各画家传记的書，很多都引了这一条，我从前讀它，不甚明白，現在才有所理解。小传云：

“玄宰天資高秀，和易近人，不为崖岸。庸夫俗子，皆得至其前，临池染翰，揮洒移日。最矜慎其画，貴人巨公，郑重請乞者，多倩他人应之。或点染已就，僮奴以贗笔相易，亦欣然为題署，都不計也。家多姬侍，各具絹素索画，稍有倦色，則謠詠繼之。購其真蹟者，得之閨房者为多。”

錢謙益是董氏的朋友，即上文所見的“受之太史”。他的話自然不是无据的。

按貴人巨公所需要的画，必須是堂皇富丽之作，这是自古而然的。宋代党太尉命人画自己的象，画成一看，大怒，說：“我前画大虫，犹用金箔貼眼，我便消不得一对金眼睛？”（見宋江休复《邻几杂志》）董氏画笔技能有限，为貴人巨公作画而請人代笔，是自有緣故的。当他的代笔面目既已行世了，而亲笔生拙之作，無論是为藏拙，还是为自珍，都不便于再公开拿出来了。而当深居技痒，或要“驕其妻妾”的时候，偶然亲自动手，却又沒想到这里便是一个漏洞，終于流传出去，給人作了比較“工拙”的資料。

至于“欣然”在那些“贗笔”上“題署”，也必有一定的緣故。推測起来，可能有

以下几种：一、市恩于“僮奴”；二、僮奴中有能为他代笔的，把他令僮奴代笔，說成了僮奴主动作伪；三、董氏被迫为人当面作画，但又不願把真面目传出去，所以用代笔作品換掉亲笔作品，而使僮奴替罪挨罵。諸如此类，是不难从情理上想到的。

还有为“庸夫俗子”当面“揮洒”的事，按錢氏所記，很有分寸。我們看，董氏慷慨为人当面揮洒的，是書法方面；对于繪画，則是采取秘密行动的。这种分別，讀起来不可忽略。当面写字的事，也有文献可征，同时也是个笑柄：

葉廷琯《鵲陂漁話》卷一“董思翁論書示子帖”条，記二事：其一引自康熙时蕭张泐《淞南識小录》云：

“新安一賈人欲得文敏書而惧其贗也，謀諸文敏之客，客令具厚币，介入謁，备宾主之礼。命童磨墨，墨浓，文敏乃起，揮毫授賈，賈大喜拜謝。持归悬堂中，过客見之，无不叹絕。明年，賈复至松江，偶过府署前，見肩輿而入者，人曰董宗伯也。賈望其容，絕不类去年为己書者。俟其出，审视之，相异真远甚，不禁大声呼屈。文敏停輿問故，賈涕泣述始末。文敏笑曰：君为人所給矣！怜君之誠，今可同往为汝書，賈大喜再拜，始得真笔。归以誇人，而識者往往謂前者較工也。”

葉氏云：“此又可見名家随意酬应之笔，常有反出贗本下者，可遽定真伪于工拙間乎？”其二引自方蘭坻《書論》云：

“思翁常为座师某公作書，历年积聚甚多。一日試請董甲乙之，乃择其結構綿密者，曰：此平生得意作，近日所作，不能有此腕力矣。某公不禁撫掌曰：此門下所摹者也。乃相視太息。”

葉氏說：“此事正可与前事相印証，思翁自賞且如此，人安能以鑑別无訛自信乎！”

我从前頗疑这是传奇家言，未免增飾。后見張敬園先生藏董氏雜書一卷，有董自跋云：

“此卷宮諭为史官时北上置余舟中，适余携至荆溪，書以贈別。宮諭不以复醬馥，而藏之書篋，今长公子固属余重題，以別于吾里之贗鼎，贗鼎多有胜余漫笔者，当重余愧耳。崇禎七年中秋，董其昌識。”

伪作有胜于真迹的，葉氏按語已論及了。如以董氏的邏輯来講，“贗鼎”包括“代笔”之作，則代笔胜于亲笔，在董氏原属常事，覺得葉氏所論还未免漏此一义。

《容台別集》卷二：

“余書画浪得时名，潤故人之枯腸者不少。又吳子贗笔，借余姓名，行于四方，余所至士夫輒以所收視余，余心知其伪而不辨，此以待后世子云。”

这“吳子”不知是吳易、是吳振，还是其他吳姓的？从所知两个吳姓的来看，吳振沒听說善書，这里書画并言，很象是指吳易。用之“代笔”，而謗称“贗笔”，这是董氏的狡猾。但又有可能，是不是吳氏由受命代笔进而自动伪造呢？至于“心知其伪而不辯”，就不免是为自家失于鑑別解嘲，这大概是为掩飾对他的座师“相視太息”的事情吧！

还有既非作伪，又非代笔，而董氏竟自坐享其名的：宝蘊楼（前古物陈列所）藏一明人縮摹宋元名画大册，摹了自李成范寬至倪瓚二十余幅，其中各图，我曾见过宋元原画的，象范寬谿山行旅图，巨然雪图，王蒙林泉清集图等。看到所摹的不但結構吻合，笔势也能在方寸之中表現原作磅礴淋漓之趣，而色泽墨彩更是相似的。册前有董其昌題

“小中見大”四大字，每幅副頁上又有董題，即宋元原画上董題之文，或楷或行，与原画上所題的也都一致。寶蘊樓影印行世，題為：《董玄宰仿宋元名家山水冊》，上下二冊，共二十二圖（以下簡稱“縮本大冊”）。觀者無不驚歎摹繪的逼真，而又疑董氏未必有這等妙技，也未必有這等的閑暇。

後見王保謨輯王原祁題畫之作叫作《王司農題畫錄》的，其卷上“仿設色大癡巨幅李匡吉求贈”條說：

“余先奉常贈公匯宋元諸家，定其體裁，摹其骨髓，縮成二十餘幅，名曰縮本，行間墨里，精神三昧出焉，此大父一生得力處也。華亭宗伯題冊首云‘小中見大’，又每幅重題賞鑑跋語，以見淵源授受之意。先奉常于丁巳夏初，忽以授余，其屬望也深矣。余是年三十五，拜藏之後，將四十年……”。

才知道這個縮本大冊乃王時敏所摹的。但新問題又出來了：我們看王時敏的著名真迹，象畢瀧舊藏仿宋元六家山水九頁一冊，乃縮摹黃公望、王蒙、米友仁、吳鎮、趙孟頫、倪瓚之作，副頁并有王氏自記宋元原畫之源流。其冊後歸張葱玉先生（珩）韞輝齋，經涵芬樓影印行世，題為：《王烟客山水冊》。其中所摹趙孟頫洞庭山圖、水村圖、倪瓚幽澗寒松圖等，我都曾見趙、倪原畫，王臨的技巧和縮本大冊比較，大有此生彼熟、此拙彼工之別。並且世傳王時敏的作品，題款字迹確實無疑的，而画法筆性及技巧，工拙却往往各有不同，可見也多是請人代筆而自己題款的。因此可知縮本大冊之是否果出王時敏手，也很可疑的。

後來見到王鑑仿宋元山水十二頁一冊，亦畢瀧舊藏（今在上海博物館），其中有八張的畫稿見于縮本大冊里。後有王鑑自跋云：

“董文敏嘗謂書畫收藏家與賞鑑家不同。……前輩風流，零落欲盡，惟吾姜太原烟客先生，魯靈光巍然獨存，其清秘閣中，尚存墨寶，然不遇知者，亦不輕示。曾將所藏宋元大家真迹屬華亭故友陳明卿縮成一冊，出入攜帶，以當臥游。余今歲偶來南翔，締交文庶社長，……余因復臨陳本贈之，枕中之秘，不敢獨擅。……壬寅嘉平月望三日……”^①

看這段跋才恍然知道縮本大冊的真實作者是華亭陳明卿。

又王時敏“題陳明卿廉雪卷”云：

“……初以趙文度為宗，既從余家縱觀宋元真跡，多有悟入，所詣益深。為余摹諸名圖，以尋丈巨軸，縮為方冊，能使筆墨酷肖，毫髮不遺，真畫史之絕技。……”

又“題陳明卿仿黃子久卷”云：

“明卿為趙文度高足弟子，初至姜時，尚守其師法，既為余臨宋元諸名跡，縮為小本，因此大有悟入，畫格遂為一變……”（此二條俱見《王奉常書畫題跋》卷上）。

陳畫流傳不多，大概多致力於摹古了。我常慨嘆明卿摹古直逼宋元，縮摹妙技，又那樣精妙，而名姓却翳然不彰，因念古代良工埋沒無聞的，正不知多少！寶蘊樓把縮本大冊

^①王鑑此冊中有四頁畫稿不見縮本大冊中，知今存之縮本大冊曾有散失之頁。

題為董作，是出于未考；王原祁的題畫語，則是有意為他祖父攘人之善，而他祖父自己却并未自諱的。

又二十多年前我在琉璃廠畫店見一大幅絹本設色山水，筆法頗象沈士充，山的主峰在畫上右方，左上角天空處題“花苑春雲，葉有年”。下押二印。此題之右有董其昌題“故人家在桃花岸，直到門前溪水流。玄宰”。下押二印。這幅畫實是葉畫董題的。當時店中標為董畫葉題，以求高價，《藝林月刊》第八十七期載之，題曰“明董其昌山水”，又注云：“絹本立幅，右（原誤，應作左）端有葉有年題花苑春雲四字。”這是董其昌坐享意外之名的又一個例子。

平心而論：董其昌在書畫一道中，自有他的特識。以功力言，書深、畫淺。所以他平生的作品中，書之非親筆的，別人偽造為多，董氏的責任較輕；畫之非親筆的，代筆為多，董氏的責任較重。至于後世射利偽作，又不在此論之列了。